

〔清〕刘蓉 撰 杨坚 校点

刘蓉集

一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文库

湖湘

湖湘文库
刘蓉集
杨坚校点

〔清〕刘蓉 撰
杨坚 校点

刘蓉集

①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湖湘文库
甲编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戚和平 谢康生 文选德
孙载夫
组 长 蒋建国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凌沙 姜儒振 吴志宪 李友志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金则恭 朱有志 刘献华
钟志华 刘湘溶 彭国甫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李凌沙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曾鹏飞 毛良才 刘国瑛
陈壮军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朱汉民 曾主陶 黄楚芳
委 员 李建国 丁双平 汪 华 刘清华 黄一九
彭兆平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谢冠军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前言

刘蓉（1816—1873），字孟容，号霞仙，湖南湘乡人，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因太平天国战事而崭露头角的许多湘籍人士之一。他的仕宦始末和事绩概略已见本书附录的《国史馆本传》和郭嵩焘作《陕西巡抚刘公墓志铭》。这里再就他的学术渊源和性格特点，结合《传》《志》稍作分析补充。综四者而齐观，将更能加深对其人其书的了解。

当时湘军崛起，名闻天下，但许多将领只是由于历经战役，以军功而显达，而其初出来担任要职，识拔提携这些将领的则都是读书人。这些读书人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在学术趋向上崇奉程、朱理学，而又强调实践笃行，反对迂疏空谈，主张经世致用。这一学术趋向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船山）起即十分显著，其流风馀韵，传承推衍而成为湖湘士子的一大特色。例如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莫不如此。他们出而带兵，是所谓儒生治军，因此不但注意将略，而且也重视品行，重视学术。刘蓉也属于这一类儒生、读书人。

刘蓉对程、朱理学的尊崇信奉是十分专笃的。他曾对一位学术思想比较庞杂的朋友说：“圣贤往矣，其言之著于六籍者，可考而知。自汉、唐来，学者辈起，然道裂言庞，述而明者卒寡。程、朱出而《六经》《语》《孟》之旨灿如日星，苟有目者皆得见焉，非其心体而躬诣之，乌能昭晰若是？夫程、朱于孔、孟不可知，然述孔、孟而能明焉，则其于孔、孟也几矣。”他认为孔、

孟已逝，自汉、唐以来学者辈出，但只有程、朱才能绍述阐明孔、孟之道，近乎（“几矣”）孔、孟之道。他规箴这位朋友：“吾与子生晚近而与有闻，谁实启之？乃弗尊闻行知以承洛、闽之绪，顾挟一知半解之私，訾其失而议所不足，不亦左欤？夫程、朱卒不可议，议程、朱者非妄则诞，愿吾子审思焉！”（《文集卷二·书陈懿叔赠言后》）从刘蓉一生的行事看，他对程、朱理学也确能“尊闻行知”（尊其所闻，行其所知），言行合一，而且终身不渝。至于程、朱理学之弊，则刘蓉自难思辨及之，因为他毕竟是功利境界中人，他的信念、识力不能逾此而有所突破，那也几乎是必然的。

刘蓉出身稍晚，但升擢很快。他虽在咸丰三年即以诸生从戎，先在曾国藩幕，继隶胡林翼军，都很受重视，但其间因弟蕃战死，老父弃养，两次回乡，家居多年。直至咸丰十年，湖南巡抚骆秉章奉调入蜀任四川总督，聘刘蓉为之赞襄谋画，给以信任支持，于是使他获得了一个足以充分施展学识才能的舞台。在他的大力整顿下，四川军务吏治，振刷一新。咸丰十一年，秉章论功奏荐，朝旨命以知府选用。翌年，同治改元，授蓉四川布政使。二年，授陕西巡抚。刘蓉在短短三四年内，由知府而藩司而抚台，这种破格提拔，实出于骆的大力保举。史称骆秉章“公忠诚亮”，“所论荐人才，悉被任用，有助名”（《清史稿·骆秉章传》）。刘蓉就是他以公忠之心所论荐的人才中的十分卓异的一个。

刘蓉受命抚陕时，太平天国还占有东南半壁，清军围攻南京，相持不下。陕西有回民的大举起义，捻军的飘忽驰突，西北局势也非常危急。刘蓉在地方凋敝，兵、饷两缺的情况下竭力筹维，克尽厥职。最为难得的是，他虽在敌情紧急，军务倥偬之际，仍能时刻关怀民生，注意抚恤穷黎，赈济医药，调节水利，举办屯

垦。有关的办法、章程，都由他亲自写定，颁布施行，体现了他拯饥救溺、康济斯民的抱负和心肠。其治军、察吏、安民、兴利的种种事绩，见于他的奏议及文集、诗集。《刘中丞奏议》二十卷，包括三百九十四件正折、附片，除了前三件是在四川藩司任内所作外，其余都作于陕抚任内。而他从同治二年七月受任陕抚到六年正月以革职之身拜发最后一件奏折止，为时仅三年有半，平均每年要发折、片一百一十餘件。从这些奏议可以看出，他的勤奋治事的精神是异乎寻常的。

但是，刘蓉就任陕抚不过年馀，就发生了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奏劾他的事件。蔡在奏疏中说薛焕、刘蓉二人：“挟重赏而内膺重任，善夤缘而外任封疆。”前句指薛，后句指刘。朝廷览奏降旨：“薛焕、刘蓉，均系朝廷大臣，如于蔡寿祺所奏不予查办，何以重名节而振纪纲？”命二人“明白回奏”，不得欺饰，如经查出，从严惩办。

在这一蔡寿祺事件中，刘蓉的性格开始充分显露出来。

蔡寿祺说刘蓉是“善夤缘而外任封疆”。何谓“夤缘”？综合《辞源》《辞海》的解释，夤、缘二字都有攀附之义；“夤缘”连用，意思是攀附上升，比喻为攀附权要，以求仕进，或凭借关系，进行钻营。《宋史·神宗纪一》：“秋七月庚辰，诏察富民与妃嫔家婚姻，夤缘得官者。”富民与妃嫔家联姻后，走她们的后门而得官，神宗皇帝要下诏查察。如今蔡寿祺说刘蓉是“善夤缘而外任封疆”，就是说他的官职是专靠拉关系、走后门而得来，而且居然做到了陕西巡抚，封疆大臣。

以刘蓉的人品、官守，为什么会遭到蔡寿祺这样的奏劾呢？他的“明白回奏”，见于《奏议卷八》的《明白回奏恳赐查办疏》及《附陈蔡寿祺挟嫌构陷疏》。原来，蔡寿祺是他在四川任职时遇

到的一位陕西籍翰林。翰林本是所谓清华高贵之官，而蔡在四川的行为却十分卑污，劣迹多端，早经前署川督崇实参奏，奉旨驱逐回籍，不准逗留川省。但到刘蓉入川时，蔡仍留在成都，继续招摇生事。于是刘蓉明令将他驱逐，并对众声言：如再不回籍，将不予姑息。蔡乃被迫返陕。未几，刘授陕抚，到西安履任。蔡自知难容，于是束装进京，仍任翰林。然后就发生了这一奏劾的事件。

刘蓉从小受理学的熏陶，对一生的名节看得很重，对个人的进退出处尤其认为是名节之大端，不容有丝毫玷污。他在回奏的正折和附片中历述自己的出身、经历和在咸、同两朝的考勤事迹，直至前年诏旨“特授陕西巡抚，以重事权”等始末缘由，说明自己不但无夤缘交结之事，而且无希荣慕禄之情，“洁白无滓之操，坚贞不屈之志，昼不歉于旦明，暮无惭于梦寐，方寸之地，皎如白日，确然有以自信而不疑。”并指出蔡寿祺是以不肖之心，作诬罔之谤，恳求朝廷细加察核，以杜倾陷。如果自己稍有暧昧之情、交纳之迹，即请从严治罪。如果查察结果，自己“幸不玷于官箴，尚无亏于大节，亦乞圣主天恩，悯臣孤危，放归田里，俾遂还山之愿，长为击壤之民”。他的这一折一片，据情直陈，剖心自明，态度光明磊落，措辞理直气壮。当时曾国藩在南京，读后非常赞赏，说：“见刘霞仙所作辨蔡寿祺诬劾一疏，置身甚高，辞旨深厚，真名作也。”（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五月十二日）曾国藩深知刘蓉。他对刘蓉的评鹭，由知其人而论其文，是十分平允公正的。

但是朝廷却不这样看。刘蓉疏入之后，上谕首先斥责了他的言语和态度：“折内有请归田里等语，词气失平，殊属非是！”接着就有御史闻风承旨，奏参他：“放言高论，妄自尊大，请旨严

行治罪，以为大臣轻量朝廷者戒！”朝廷命骆秉章查明刘蓉所言蔡寿祺在川招摇各款是否属实，秉章复奏，谕旨虽将蔡革职，但仍以刘蓉疏辩“语多过当，有乖敬慎”，交部议处。部议的结果是：“降一级调用，不准抵销。”诏如所请。（本段引文均见《国史馆本传》及《奏议卷十二·请假回籍修墓疏》）曾国藩对此的反应是：“霞仙以本年复奏一疏降调。如此名奏议而反以获谴，颇不可解。”（同治四年八月十七日日记）

这一类言官参劾、朝廷究办的事，是封建官场所常有。言官所参，哪怕仅仅出于风闻，皇上也照例要降旨究办。被参者如果确系冤抑，据情回奏，落实之后，也就无事。但回奏的态度必须恭慎，措辞必须谦卑，即使十分冤枉，也须表示诚惶诚恐，个人毫无怨尤，悉听朝廷处断。否则，奏语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本来是针对言官的辨诬，却被视为对皇上的不敬，事情就麻烦了。刘蓉的获谴，正是因为按照当时官场的习俗和惯例，他的回奏的态度比较躁急，语言也比较激切的缘故。

5

受了降调处分之后，刘蓉即请假回籍扫墓。朝旨先予允准，后又收回成命，要他“仍带革职留任处分署理陕西巡抚”。他一面谢恩，一面又告病乞休。数月后，同治五年七月，他又奏自己病难痊愈，请开缺（离职）回籍调理，并请将巡抚关防暂交藩司林寿图护理。但朝廷十月仍谕：“刘蓉候（新任巡抚）乔松年到任后，仍当与之会办军务，不得置身事外。”

刘蓉是个实心实意、顾全大局的人。尽管自己已经告病乞休，而且新抚已经到任，但朝廷还未允他脱身，他一日在职，一日仍尽心竭力地办事。他在“革职留任”后所上的许多奏议，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然而正是所谓“困于株木，入于幽谷”（《易·困》初六）吧，蔡寿祺的诬劾已使他的处境如株木挡道，新抚乔松年

的排挤却使他走入了更加幽暗的低谷。原来，他和乔共事不久就发生了龃龉，弄到双方都到皇帝那里告状。关于这一桩官司，《清史稿·乔松年传》只有短短几句话：“松年初至，与蓉意见不合，奏劾蓉军政隳坏，留陕无益，蓉亦劾松年掣肘，贪利徇私。”《清史稿·刘蓉传》则只有“蓉与松年议不合”七个字的记载，就中曲折，都无交代。《国史馆本传》且不著一字。但保留在刘蓉《奏议卷二十》最末篇幅中的三折、六片，却清楚地表明了双方互劾的原委和实质。简言之，一个是出以公心，一个则多存私意；一个是鲠直任事，一个却巧猾推延。其间，刘蓉因事权不一，多方掣肘所造成的困境，令他缚手缚脚，无法施展，由此而支左绌右，瞻前顾后，事功难集，自在意中。对此，朝廷本已对他十分不满。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上谕切责：“迭次谕令刘蓉出省督剿，该前抚置若罔闻，高卧省城，养贼自重，以致军无统率，任贼纷窜，不知是何居心！”（《奏议卷二十·复奏未即出省情形疏》）可以看出：这样的切责后面隐现着乔松年告讦的影子。刘蓉不得不上疏说明自己未即出省城“督剿”的为难原因（见同疏）。然而正在这时，捻、回攻及渭南、临潼，逼近西安城垣。于是刘蓉督师奋战，最初获胜，进而追击，不料于十二月十八日在灞桥遇伏惨败。

这是一次震动全国的大败仗，所谓“灞桥之溃”，在《清史稿》刘蓉传、乔松年传中都有记载。曾国藩日记（同治六年正月初一日）也写下了这次惨败的大概，并由此推测它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未刻阅本日文件，见秦兵于十二月十八日大败，几于全军覆没。贼势日盛，深恐其渡河窜晋，震惊京师。”比较详细的败况，据刘蓉的奏报是：总兵萧德扬及其以下升用提督、记名提督等战将多名阵歿，伤亡员弁兵勇近三千人。战败的原因，刘蓉

自己检讨是由于指挥失当，轻率追进，又值风雪凄迷，遇伏无路突围，致在灞桥附近几乎全军覆没。从指挥心理上，他的急切追进，似乎与诏旨迭次严促“出省督剿”，不无关系。至于他以儒生带兵，非同沙场宿将，老练沉稳不够，自亦咎无可辞。

灞桥在西安府城东北二十里，是历史上有名的古迹。不著撰人的古书《三辅黄图》最早记载此桥，说：“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折柳赠别。”自后屡见文人吟咏，像杜甫的“怅望东陵道，平生灞上游”、岑参的“初行莫早发，且宿灞桥头”，都是唐人留连咏怀的名句。如今严重的败衄恰又落在这个著名的古迹上，重重获谴自在意中。谕旨严斥，但也是最后一次的严斥了：“刘蓉以获咎之身，特令署理陕西巡抚，暂留办理军务，倚任不为不专。乃屡谕该署抚出省督剿，置若罔闻，以致官军挫失，捻势愈张，贻误地方，实堪痛恨。刘蓉着即革职，毋庸再留陕西！”（《国史馆本传》）刘蓉的仕途也就从此结束了。

综观刘蓉一生的为人行事，他的性格方正刚严。对自己，出处行藏，一丝不苟；对别人，直道而行，邪曲难容，甚至疾恶如仇。这种人只宜在书斋里埋头做学问，出而问世，则周旋应接，实非所长。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适逢他五十初度，时在西安。他帐触平生，赋诗八章，其第二章追怀亡父，悯叹己身，解剖自己性格和才力的短长，很能说明问题：“壮岁传经尚激昂，早烦庭训决行藏。名山或许千秋业，瀚海终非一苇杭。疾恶范滂嫌已甚，忧时郭泰果无方。慈颜寂寞今黄土，回首湘山泪数行。”首联说自己壮岁能以经学授人，表现良好，父亲早为其决定了一生事业的方向；次联述自己的才力，于著述或可有成，对茫茫世途则犹如瀚海一苇，非所能航；三联更剖析自己性格及才具之短，引东汉名士自喻：疾恶如范滂而犹嫌太过，忧时如郭泰却应变无方；

末联以深情缅怀亡父作结。这章诗后面还有几句注，更加直白：“先赠公（蓉父曾被追赠光禄大夫）尝语小子曰：‘尔无应变之才，而疾恶已甚，将不能有为于世。惟努力穷经，或尚有著作传于后耳。’”（《诗集卷一·同治乙丑四月二十三日为予初度之辰枨触平生感而有赋率成七言近体八章》）刘蓉在家乡所居的堂屋，额曰“养晦堂”，也是他父亲所命名。“承家严命，揭其额曰‘养晦’，盖欲其务韬晦以自修，故寓意以示警耳。”（《文集卷四·复曾涤生侍讲书》）父亲对儿子的性格知之甚深而戒之尤切。谚云“知子莫若父”，这是一个适例。

刘蓉的性格大约在当时就很出名，但对驳蔡、劾乔一类事，一般人往往只就其后来的结果，用乡愿的眼光，发庸俗的议论。郭嵩焘曾经记述当时在京的湘籍官僚的一些风气和议论：“京师局面，一循道光末年之风气，而相奖为无用。如刘霞仙、曾沅甫之为人，但以‘有脾气’三字了之。”（湖南人民出版社版《郭嵩焘日记》，同治十二年六月初八日）这段话的意思是：北京的情况，是循袭道光末年（万事苟且敷衍）的风气，互相奖劝，只求做个保住官位然而无所作为的庸人。如对刘蓉、曾国荃的为人，全不问事情的是非曲直，而只说两人“有脾气”。曾国荃（沅甫）同治五年任鄂抚时与他的顶头上司湖广总督官文不协，奏劾后者“贪庸骄蹇”，自己也不久去职，行迹与刘蓉相类。（见《清史稿·曾国荃传》）郭嵩焘深知刘，也知曾。他对京师那班浅人的俗论，表示不以为然。

曾国藩、郭嵩焘都是刘蓉的知交。刘和曾在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即已相识，十七年（丁酉，1837）再见于长沙，郭嵩焘来会。其时曾廿七岁，刘廿二岁，郭只廿岁。三人由于志趣相仿，意气相投，遂结拜为兄弟。忆某书记载曾有人见过他们结拜

时所写下的金兰谱，惜已忘为何书。但从下面所引刘诗“合作金兰契”之句，可知这次结拜当是事实。原来，这次相聚分手后五年，刘蓉写诗给曾、郭，诉说自己的思念，回忆当时的印象，深情地铭记着这一郑重的盟誓：“人生谁百年，忍此长途别。一别五载馀，尚能几良觐？万里一相思，长风起天末。孤灯亘长夜，梦想见颜色。……二君命世英，而我独顽劣。探怀出肺肝，相视成莫逆。重以松竹盟，合作金兰契。手足自相依，宁论胶与漆！”（《诗集卷一·寄曾涤生侍讲兼柬郭筠仙孝廉》）青年时代的纯真友谊是最坚贞的。三人从此成为生死之交，互相勸勉，互相关怀。经过数十载的颠顿沧桑，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先歿。第二年（1873），刘蓉在由陕回湘仅仅六年之后也告病故，时仅五十八岁。郭嵩焘为曾作了墓志（铭辞是刘蓉所作），为刘作了墓志铭。他又在曾的专祠附设了思贤讲舍，以求传承曾的学术，并刻印了刘蓉的遗著。光绪十七年（1891），郭嵩焘自己也倦极思归，溘然长逝。他没有辜负和曾、刘的金兰之盟。

刘蓉的遗著四种，刻印时本来都各有封面，独立成书。《养晦堂文集》《养晦堂诗集》的书牌上各镌有“光绪丁丑仲春思贤讲舍校刊”字样，即刊刻于光绪三年（1877）。《刘中丞奏议》和《〈思辨录〉疑义》的书牌上镌的是“光绪十有一年思贤讲舍校刊”，即1885年。《〈思辨录〉疑义》是刘蓉早年的一部著作。据卷首自序，系作于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他三十一岁。《思辨录》著者陆世仪，号桴亭，江苏太仓人，明清之际学者，明亡，不应科举，授徒讲学。他为学恪守程、朱，主张敦守礼法，施行实政，不空谈心性，不虚言诚敬。《思辨录》是他记述师友问答及平生闻见的一部笥记。由于内容繁冗，于清初经张伯行删汰编次为《〈思辨录〉辑要》三十五卷，录入《四库全书》。刘蓉所见，

即这一部。《四库全书提要》谓陆氏“于近代讲学诸家，最为笃实”，“其言皆深切著明，足砭虚矫之病”。这种学术品格，也是刘蓉所最崇仰的。但他仍对陆氏所讲有关“性命之本原、学问之旨要”的许多论点，间有所疑，就条举驳难。其方式是先撮述陆文，再申明己说，共四十一条，凡二万一千馀言。也像陆氏原著一样，是一部纯粹的学术著作。

郭嵩焘所作的刘蓉墓志铭说：“公所著：奏疏若干卷；《养晦堂诗文集》十四卷；《〈思辨录〉疑义》二卷；经史撰论甚繁，皆未成书。”按思贤讲舍刻本凡《奏议》二十卷，《诗集》二卷，《文集》十卷，《〈思辨录〉疑义》则并不分卷；书名、卷数，间与郭氏所述有所参差，盖因郭氏作《志》时刘蓉遗著当未编定，故只大概言之。至于刘蓉是否还有其它遗稿，则至今未有发现。《诗集卷二》有《废麓中得旧稿数卷聚而燔之》一首，说明他无意存留自己的旧作。又《文集卷三·致某官书》文末有曾纪泽按语云：“公晚年焚弃旧日诗文，什芟六七”，芟除而焚弃者如此之多，则未芟之三四，大概就是现存的诗集二卷和文集十卷了。曾国藩在歿前数月读到了刘蓉的芟馀之作，同治十年十月十九日日记云：“二更后读霞仙所作近年诗文，渊（意蕴深厚）懿（词翰优美）畅（思路开展）达（笔致明快），较昔年已大进。”他所作的今昔之比，似乎已在不经意间道出了刘蓉焚弃旧稿的原因。至于奏议，从其全部内容综合考察，也许一篇也未缺少，那是他抚陕三载的实录，为官施政，问心无愧，必须留诸后世，以待论定的。要知道，他去世时还背着革职离陕的处分。这对一个重视出处行藏进退辞受的儒生，自难于翫然置之。《诗集》的末篇是《杂兴》五首，大概也即是他的绝笔吧，中有句云：“寓世已如将断梦，著书欲付未来生。丈夫磊落从吾好，那计千秋不朽名？”感

情复杂而且矛盾，自云不计千秋不朽之名，也许正是因为还有千秋之名的念头。又云：“后世可能传断简，当年曾是枕长戈。悲来掩卷空垂涕，肠断阴山《敕勒歌》。”则对抚陕经历的沉痛之感，跃然纸上。后来诏令刘蓉开复原官，又在陕西、四川得以入祀名宦祠，虽都是死后之事，也算是还他以历史的公正了。

本书将上述四种刘蓉遗著合为一书，题曰《刘蓉集》，点校出版，是思贤讲舍刻本后的第一次重印，也是第一次的刘蓉全集。原刻少数剥蚀朽坏之处以及漫漶难辨之字，均以白匡□□表之，有一处原刻为整行墨格，十分触目，似是刻竣检视，因故又将文字删去，书中已作注说明。至于对原刻讹、脱、衍、倒的处理，大致仍循当前点校古籍的通例，以方、圆括弧分别表示拟改、须改的文字，有存疑者，则于方括弧中加一问号，偶亦于页末出校作注。本书承杨云辉同志作为责任编辑，对照原刻，仔细勘对，得以改正许多讹体别字和标点错误，补苴罅漏，提高质量，谨于此申以谢意。

杨 坚

二〇〇七年七月

总 目

上 册

奏议

下 册

文集

诗集

《思辨录》疑义

附录

总
目

1